

立日自述
立日自述



韩素音 著
邱雪艳 梅仁毅 译

寂夏

15.6
8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海外炎黄精英丛书

韩素音自传

——寂 夏

韩素音 著
邱雪艳 译
梅仁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素音自传: 寂夏 / (英) 韩素音著; 邱雪艳, 梅仁毅译.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1 (1994.12 重印)

ISBN 7-80074-526-0

I. 韩… II. ①韩… ②邱… ③梅… III. 韩素音-传记
IV. 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5464 号

海外炎黄精英丛书

韩素音自传—寂夏

韩素音 著

邱雪艳 梅仁毅 译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30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国家建材局情报所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 280 千字 13 印张 4 插页

版次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1994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074-526-0/I·238

定价 10.80 元

序

洪素青 Hau Sui-ying

西哲有言，人而无知一己民族的历史，终将在劫难逃。民族文化的倖存有赖于民族自觉及热爱这一文化的过去，有赖于有意识的确认其不断做出的努力与成就。这些努力与成就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蕴育了文化。

中国文明的源远流长，至今还如此强劲有力，能够适应及生存于历史长河中的迭次变革，因为它能坚守历史的延续性。虽然这种对于过去时代的依恋，有时遭到批评和指责，因为它对新形势的适应过于迟缓。可是从时间递嬗的眼光看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中国较其他国家（除了日本），其变化是远为迅速的。

整个人类既是历史重大事件的产物，又造就了我们社会行动和我们的意识。作为一个欧亚人，介乎两种文化之间，我在数十年生活中比多数人更深感其互相的汇合与促进。这两种文化，对我个人性格的形成显示了巨大的历史性力量。

因此，我写这些书，不但是部自传，仅仅记录我个人的生活以及形成我性格的具体环境，而更为重要的是关连到当时的中国以

及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这是一个初次尝试，我想通过个人或许多“个人”，使历史知识易于被人接受；也许可以这样说，作为一个个人，我在历史发展和受其左右的人们之间，发挥了它的一线牵连作用。

所以，这样的书写来并不容易。我的目的是要使读者注意到我们这些人，浮沉在历史的宏伟长河之中，巨浪时起时伏，我们既是它的组成部分，又是主体和活跃于其间的主要力量。

我的这些书，在某些西方大学里今天被作为值得研究的历史著作。但他们又可作为消闲的读物。这些书里并不尽是死者、枯骨，或是指导过生活的事迹与岁月的积聚，而是我们亲身经历过和意识到的一部分，构成我们的灵魂与决心。

“只有知道我们的过去，才可能使我们支配与塑造我们的未来。”今天，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被孤立起来或者自我孤立于大地上其他国家及民族之外。我的这些书，我想是可以供给年轻人若干知识性和趣味性的读物，因为这些青年正在探索对于他们各自生活的意义。

(冯亦代 译)



第一部

1938年——1942年

第一章

1967年，当我站在马赛的马尼比埃大街上时，我又重新进入了1938年站在同一个地方的一位名叫罗莎莉·周的二十岁少女的角色。她当时毫无同情心、自私、极端无知。北面刮来的刺人的寒风吹在她那沾满泪水的脸上。是昨天那幽灵般的哭泣和阴森森的寒风选择了今天，因为，除了表示成就的乐善好施的表演外，今天十分需要面对现实，这种要求又一次响亮地提出来了。我们即将开始另一场战争，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因此选择就更为紧迫。今天东方是红色的，未来已进入我们的现实，已经在现实到来之前就改变了它。昨天中国开始的事业，今天全世界在继续进行。北风在歌唱着它的名字，它的名字就是革命，世界革命。这名字连教皇都知道，并劝说富人搞一点吝啬鬼式的施舍，来阻挡广泛的对公正的渴求。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准备为此而战斗。今天越南发出的响雷，鼓舞着拉丁美洲出现更多的越南。中国三千万红卫兵进军的歌声，动摇了正常的秩序，变成了青年人无法无天的场所。我又一次站在无数的讲台上。在美国、在欧洲，在过去两年我走上了一百次

讲台，讲述这种动乱的吉兆和凶兆。今天，随着北风吹来的歌声，一个新的开始就在卡尼比埃大街拐角处等待着。逝去的时日把1938年我这个古怪有趣的鬼影的泪水缩小成为一种滑稽可笑的毛毛细雨，一副个人痛苦的怪相，而泪水作用于其上的面孔则成为没有眼睛的窗玻璃。

当我们——昨天的罗莎莉·周和今天的韩素音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就在那时间的小小裂缝中，在这种时间里什么也没有开始，什么也没有结束，另一个怪影从马赛大街的漩涡中出现了。他是一个个子高高的、一副老鹰长相的中国人。我认识这个人，他是雷蒙·吴，和我一样，从1935—1938年是布鲁塞尔大学的学生。从他平静的眼光里我很快又抓到了他那一丝恶意。这种恶意他隐藏得十分巧妙，使他在大学一次考试也没有通过，照样连续七年拿到奖学金。我回想起他为了回避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总是拿起颠倒了种族主义这个武器，其进攻的自然目标当然是欧亚血统的人，是我。

随着人流的推拥，他来到了我面前，我一点不觉得惊奇。我应该遇到我书中的人物，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就在两个月前，在美国作报告时，我走进一家中国餐馆，不是就碰到了店主罗伯特·潘吗？他是1933年我在北京燕京大学的同学，当时也是一个爱国的道德主义的鼓吹者。现在呢，他微笑着为那些从加利福尼亚军营到越南去的美国大兵服务，在蒙特雷城为他们做炒杂碎。在北京、巴黎、新加坡和伦敦的街头，我不也见到了其他许多人吗？人这么多，使我生活中的许多事和其他许多人的活动、风险和存在交织在一起。

雷蒙·吴开始说话。“当然啰，你就是罗莎莉·周。那么韩素

音这个名字又是干什么的呢？”

“这是笔名。”

“你真的回过中国吗？”

“是的，我回去过好几次。”

“没有对你怎么样？”

“没有。”

他沉默不语，难以置信。现在轮到我发问了。

“那你呢？你没有回去过吗？”

“我想过好多次。”

“你以前老谈爱国，救国……”

“当时我认为还是等一等好……情况不明……后来德国人入侵比利时，德国驻比利时的军事总督冯·福肯豪森把我们赶出来了，把所有的中国学生都赶出比利时。……那是1940年……我到马赛来了，有的学生乘船回国。……”

“你是说你在马赛已经呆了快三十年了。”

“我现在是一个商人。我想过回中国去……今年去访问一下……如果你保证我能回马赛我就去。”

我惊愕地看着他：“你真荒唐。这事要由中国政府来决定，谁也無法施加压力或影响。”

“如果你和他们没有关系，对他们没有影响，那你为什么要到处讲中国问题呢？如果你得不到任何好处，那你为什么……”

我生气地摇了摇头，从他身边走开。我又一次被这种屡见不鲜的特征所难住。在这些特征中，有一种就是他们无法理解一个人是按其信念行动，而不是为了得到回报、荣誉、甚至理解而行动的。雷蒙·吴紧跟着我，现在几乎是在嘲笑我，因为他发现我并没有受到

保护。

“真是非常勇敢……我还从来没有听到其他人谈论中国。谈论中国在这儿不受欢迎，文化大革命也不受欢迎……西方人都害怕这场革命……当然啰，如果你不跟他们站在一起，那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呢？而他们还攻击你。就在一个月以前，你的书在一家中国报纸上受到攻击……你一直在为之解释的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你的著作，攻击了你……文化大革命谴责你……”

他跟着我走了一程又一程，他的鞋踩在鹅卵石上在我身后发出回响。“留下你的地址……我想给你写信……”我没有回答，他也就算了，不跟在我后面了。我一面走着，一面让旧愁勾出新痛。这种痛苦从脚底往上涌，拍打着一腔胆汁，发出汨汨声。

第二天阳光倾泻在城市之上，冲刷着山墙，大量照在黄色的屋前。北风刮在鹅卵石上，反弹起来，拍打着遮日的布篷。树木扭转过来，斜向土地，请求保护，以避开海风。革命，革命，整个世界在未来之风面前折腰……

“他们不要你，这些塑造你梦寐以求的明天的人们不要你……那个明天不是为了你的，你属于剥削阶级，你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前进，前进”，风在呼唤。

我想到那些意志不坚、改变信仰的人。报纸上斯维特兰娜·斯大林那张微笑、呆板的脸使金色的月亮更圆……一百万美元换取一本关于她父亲的书，伟大而令人畏惧的斯大林的书……

过去岁月中的又一个幽灵出现了，这次是在布鲁塞尔，我去以前上学的大学讲中国问题。这位幽灵是莉拉，过去的一个同学，当时是一个共产党员，现在是一位体面的资产阶级分子。当时莉拉讥笑我政治上的无知，责备我不参加政治活动，不做一个“积极分

子”。“你是一个胆小鬼。”现在她那封闭、沉默的生活饱藏珠宝，她批评起我的坦率来了。“你没有政治头脑。”她责备我支持越南、中国和亚洲。“至关重要是必须有和平——我们不要战争……”“但是我们已经在打仗了，在亚洲。”我答道。突然我意识到她的“我们”和我的不一样。她讲的是富人，而我谈的是其他人。对莉拉来说，只要她自己没有被卷入，就不存在战争，即使整个世界都在流血。

莉拉说：“我再也不愿意陷在里面了。”在比利时她被纳粹抓住，在拉文斯布拉克集中营关了两年。她不肯再谈那些可怕的年月。没什么人谈他们的集中营生活，他们避免提起集中营中的种种罪恶。今天莉拉否定了过去，以她新的智慧使我吃惊。今天她确信不卷入是对的，就像三十年前她确信卷入是对的一样。

“你应该明白，我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依赖这个社会……在这儿，政治上积极是不行的……再说现在情况大不相同了……由于核武器的出现，最重要的是每个人应保持沉默……”

可能有一天我也会给自己找出充分的理由来保持沉默。我毕竟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我胆怯、犹豫、容易被吓住；我反对，也不愿意支持任何一方，跟任何政党都不发生关系，即使现在也是这样。我不能想象自己会参加任何组织……但是我听见风在呼唤，伟大的明天的风在唱它伟大的歌。它告诉我，我们必须再作一次旅行，再作一次选择。昨天的罗莎莉·周作了选择，今天的韩素音亦将如此。……

然而罗莎莉和我都曾有过的希望，希望有一天，在上一次旅程结束时（旅行者啊，是哪一个旅程？朝着什么目标？），她能在屋里过上某种安安全全、无忧无虑、舒舒服服的日子。这屋子有两扇

门，她小时候画过一幢这样的屋子。

今天我已经打开了这两扇大门，我知道这两扇门是通向一个伟大的地平线的两个出口，在它们后面没有巢穴，没有地洞，没有墙、窗，也没有屋顶，没有可以喘息或休息的地方；只有大海吹来的风，唱着优美的曲子。革命，革命，你的名字今天是越南，明天是玻利维亚、巴西或印度。任何人也逃脱不掉，谁也不行，连莉拉也躲不掉，不管她怎样保持安静和沉默……

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更加艰难，更加小心翼翼地走着，因为我知道我走错过路，走错过几十万次，也知道星星是不长眼睛的。多少比我能干得多的人变得意志消沉，十分苦闷。尽管如此，面对着报上斯维特兰娜的笑脸，我只能回答：“莉拉，你用谨慎的习惯铺设的宽广大道是好的，但是不论是你还是我都无法到达长夜的尽头。你对我说我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你给我列举了已经死了的人，数十年关在监狱里不见天日的人，或者是像你一样聪明的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成长，因为他们抛弃了错误的选择。但是我必须继续走下去，因为我听到了大风的歌声。夏日的小鸟不足以庇护，厌倦和懒惰也成不了藏身之处。”

一个很花哨的桔黄色的卷宗里存着我的信件，这些信是1938年9月在从马赛去中国途中，在法国客轮吉尼·拉波梯号上写的。这些信不可避免地只能是给留在法国的一个人，因为当时他似乎还能理解我。他是约瑟夫·赫斯，一个起父亲作用的人，我青年时期的导师。他在比利时给我弄到了奖学金，尽管他知道不该给我办这件事；他给我钱使我能离开比利时。我放弃了学习，扔下了外祖父和男朋友，放弃了“光明的前途”，所有的人都说我前途光明，决定回中国去，因为中国在打仗，我不能袖手旁观，我不能不回去。

赫斯的儿子是在 1966 年 4 月复活节那一周的周末在布鲁塞尔把这个破旧的硬纸板的卷宗交给我的。约瑟夫·赫斯死于 1965 年 11 月。从 1905 年他首次到中国起，他为一家大公司的利益卖命六十年，结果还是被这家公司抛弃了。一个枯瘦的八十岁的老人，在他死前几周，在一次公司的行政会议上被隆重地宣布解职了，理由是像他这样年纪的老人应该退休，靠自己的积蓄生活。“我没有工作，也没有退休金——为什么我活得这么长？我现在靠卖书和卖古玩维持生活。……我没有积蓄。”他那封痛苦地叙述如何被迫辞职的信，一直由我保存着。我给他寄了些钱。他给他的朋友们写了一封信，想募捐到更多的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他处于半昏迷状态，他以为自己又回到了中国，自言自语道：“快，要不我们就看不见日落了。”

他儿子给我的卷宗，是很多学生卷宗中的一个。这些学生跟我一样，享受用庚子赔款提供的奖学金。赫斯保存了我们所有的信和他回信的复写件。

卷宗的内封插着一份打字的备忘录，注明的日期是 1952 年 11 月，是赫斯自己写的，目的是对我的一生作一个概括。但这是一个奇怪的小结，有很多错误，也回避了不少东西。

1934 年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刘瑞恒博士对我说：“我办公室有一个年轻的雇员，叫罗莎莉·周小姐，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姑娘……你能不能给她提供一笔奖学金？”

约瑟夫·赫斯第一次见到我是在北京圣迈可教堂的前门廊，时间是 1932 年，而不是 1934 年……为什么要带上一个刘瑞恒博

士呢？

是什么促使他写下这份采取守势的、辩解性的备忘录呢？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辩解的。为什么备忘录写于1952年11月而不是在此之前呢？我知道他当时正在考虑写他的自传，他说过，“我已经把一些材料整理出来了。”虽然他收集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包括写给他母亲的信，从1905年到三十年代他母亲逝世为止，这些信都收集和装订在几个大硬纸夹里，但他从来没有动手写。

也许约瑟夫·赫斯的动机是陈腐的。对我的经历和变化他感到负有责任，想为自己辩护开脱一下。而我们之间吵吵嚷嚷的争论，我们之间独特的、精神上的友谊突然变得可疑起来。这完全由于他感到有必要强化自己是一位沉着、体面的人物的形象。在整个关于我的备忘录里，到处可以发现有关日期和事实上的奇怪的错误，而成段甜言蜜语的说教则使生动的事实听起来反而不真实了。

备忘录继续写道：于是我会见了那个女孩子和她的父亲。她父亲是周映彤先生，1886年出生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跟一位比利时妇女结婚。从1904年到1913年周映彤在比利时学习，后来成为一名工程师，带着妻子回中国，在铁路上工作。他的第一个工作是我为他在陇海铁路上谋得的。他们生了四个孩子，最大的孩子渴望得到深造，但父母并不热心。他们要她嫁给美国驻北京使馆的一名海军陆战队中士。

我母亲对女儿所抱的希望就这样在最后一句话里被简化了。她恨罗莎莉（也就是我），而蒂莎是可爱的，玛丽安很漂亮。“一个美国人……你生活就不用发愁……美国人都很有钱……”我看到母

亲笑了，露出她掉了牙的牙龈，她那棕色的眼睛蒙上了一层欣慰和安全的前景；她想到女儿都嫁给了美国人……现在我母亲葬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座公墓里，墓碑上没有记下我的哀思。这部分省掉了，因为即使死了，这位固执的女人也不宽恕（我）。而我为墓地、葬礼以及有关仪式付了钱。只是在她死后，我才开始对这位固执的女人产生一种近于儿女对母亲的爱，才发现我们之间因厌恶而产生的隔阂由于迟来的宽容而得以铲平。我开始发现自己继承了她的很多东西，她的强壮体魄、她的固执己见……也继承了不少她的愚昧无知。这种发现并没有使我感到烦恼。

可是，年轻的周小姐坚决要求学习。

她父母最后同意了。

由于她中文还不行，她先在燕京大学念了两年，1935年乘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前往布鲁塞尔。

1935年夏天在北京。日本人涌入这个富有适应性、死气沉沉的城市。……在北京饭店碎石铺成的院子里，一个穿高统靴的日本将军从一辆瘦狼似的黑色轿车里出来，他那长得出奇的军刀拖在碎石地上，向站得笔直、穿着黑靴戴着白手套的肥胖的中国将军伸出他的白手套……

1938年在布鲁塞尔我又见到了她。她学习得十分出色，不过这时却在中国—比利时友好协会的主持下，正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发表爱国演讲中去。

我记得赫斯嘲笑我道：“你认为你能制止战争吗？站在讲台上不断重复那些老生常谈就能制止战争了吗？你对中国了解多少？你对战争又了解多少？”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又站在讲台上讲中国问题。我不认为我能制止一场战争，因为我们已经在打一场战争；但是我认为保持沉默就是犯罪，对于那些能开口说话的人，沉默罪是不可饶恕的。

她正在考虑跟一个年轻的比利时律师结婚，但估计她的责任是回到中国去。就这样一句话把路易斯打发掉了。路易斯是一个可亲的幽灵，因为他也卷进来了，他没有保持沉默……。

在从马赛回中国的船上，她遇到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军官……他们在武汉结婚。……这段婚姻时好时坏，有起有落。她刚到中国，有些从欧洲回国的中国学生就说起她的闲话来了，这使她非常生气。她给我们所有的人写信，宣布要和我们一刀两断。

整个具有变幻的魅力的情景就在这种听来的胡说八道中消失了。更大范围的场面也这样消失了。我指的是 1938 年到 1948 年那段腐败和破坏、杀戮和失望的时期，但那也是一个希望和胜利的时期。

我写的就是这段时间，这场战争以及它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当时想的和感觉到的都要加以批判、否定、抛弃，就像对待一出坏戏，失意时刻的真情，一条分界线；就像发生在舞台上的没有预料